

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国际争端的解决

(迈克尔·伍德爵士)

A. 引言

1. 这份潜在专题的提纲源自委员会之前的工作。大家记得，2011年委员会二读通过了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¹大会也注意到委员会的工作。²早在2002年，委员会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工作组便提到，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必须改进解决这些争端的办法”。³2010和2011年，委员会就和平解决争端问题举行了辩论，对今后可能考虑的专题提出了各种建议。⁴

2. 拟议的专题应限于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争端的解决，⁵其中包括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的争端(包括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以及国际组织相互间的争端，但不包括国际组织不是当事方，而只是以某种方式介入其中的争端。在这个意义上，将不包括由一个国际组织主持的争端解决(例如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章采取措施，介入会员国之间的争端)。同样，有些争端仅涉及国际组织的利益，如成

员国关于该组织的章程的争端，⁶也不在此专题范围之内。

3. 本提纲主要关注国际性争端，即这些争端源自受国际法规范的关系，不涵盖涉及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的争端(国际行政法)，也不涵盖有关国际组织豁免权产生的问题。至于是否可包括一些带有私法性质的争端，如因合同引起的，或国际组织的侵权行为或针对国际组织实施的侵权行为产生的争端，可留待以后作出决定。⁷

4. 本领域专题可能的产出形式问题，需要仔细斟酌。可以是针对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争端，提出发展已有的和制定新的解决争端程序的建议，和/或提出示范条款，以纳入相关的文书或条约。此外，委员会不妨研究1982年《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⁸看该宣言的条款可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国际组织。

B. 拟议的专题内可能考虑的问题

5. 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困难，是解决所有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国际争端所共有的。这是由于国际组

¹《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1页及其后几页，第87-88段。

²2011年12月9日大会第66/100号决议。

³《200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5页，第486段。

⁴见2010年7月29日委员会第3070次会议的简要记录(《2010年……年鉴》，第一卷，第287页)，以及分别于2011年5月31日和6月1日举行的第3095和3096次会议的简要记录(《2011年……年鉴》，第一卷，第120和第127页)。2010年，委员会收到秘书处关于争端解决条款的备忘录(《201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623号文件)，而2011年则收到由迈克尔·伍德爵士编写的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工作文件(《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641号文件)。

⁵“国际组织”一词的理解应沿循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中的定义(第2条(a):“‘国际组织’是指根据条约或受国际法制约的其他文书建立的具有独立国际法律人格的组织。国际组织的成员除国家以外，还可包括其他实体”(《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1页))。

⁶例如，见对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管辖权的上诉案，判决，《197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6页起，详见第60页，第26段。国际法院在其中指出“本案被伪装成国家间的普通争议提交本法院(本案背后也存在普通争议)。然而在法院的诉讼中，实际上其中的一方所指责而另一方为之辩护的却是一个第三方实体，即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的行为”。

⁷解决有关这类问题的争端，必须考虑国际组织享有豁免，以及在某些条约下国际组织有义务对解决争端的适当方式作出规定。较为普遍的情况是，对这类案件规定采用包括仲裁在内的特别程序。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公法顾委)的议程上有一个项目：“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但带有私法性质的争端的解决”(见公法顾委第五十次会议报告，2015年9月24-25日，斯特拉斯堡，CAHDI(2015)23号文件，第23-29页)。公法顾委在一份问卷调查中征求各国的意见，但尚未公布(CAHDI(2016)9 prov)。

⁸1982年11月15日大会第37/10号决议附件。

织在利用传统的国际争端解决办法上渠道有限，也因为对国际组织作为原告和被告提出的主张可否受理存在障碍。另一方面，将传统的国家间解决争端机制用于国际组织，还有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国际组织不是国家。

6. 渠道：将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国际争端提交各国可以利用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各种困难，⁹ 最明显的是，国际组织不能在国际法院的抗辩性案件中作为请求人或被告人，尽管在一些特定领域，其他一些常设法院和法庭向它们开放。仲裁仍是一个选项，但现有的实践十分有限，国际组织也很少受到管辖权条款的约束。可以采用法律以外的方法，如调解、和解和调查等，但国际组织不同于国家，往往不属于方便进入该类程序的机构。例如，联合国或区域组织的成员国可将它们的争端提到一个政治论坛，从而借助多边政治力量和程序解决问题，如真相调查团。由于在第三方解决争端机制方面存在这些障碍，解决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争端，主要依靠谈判或组织内部的机制。

7. 可受理性。由国际组织和对国际组织提出的诉讼，在可否受理上所面临的困难，主要在于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和相应的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要求。比如，国际组织能像国家维护其国民的权利一样，维护本组织工作人员的权利吗？再者，如果国家对一国际组织主张其国民的权利，用尽当地(国内)补救办法的要求适用吗？

1. 国际法院及其他常设法院和法庭

8.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四条第一项将到法院起诉的资格限于国家。¹⁰ 尽管第二和第三项对法院和国际公共组织之间某种程度的合作作了规定，¹¹ 但

⁹ 原则上，和平解决争端的机制适应于国际组织没有争议(见对执行联合国职务时所受伤害的赔偿案，咨询意见，《194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4页，国际法院在意见中，除其他外，讲到联合国可以对国家提出国际索赔)。这类机制，包括“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方]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另见F. Dopagne, “Les différends opposant l’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à un État ou une autre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载于E. Lagrange and J.-M. Sorel (eds.), *Droit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2013), 第1101页起，详见第1109页。

¹⁰ “在法院得为诉讼当事国者，限于国家。”

¹¹ “二、法院得依其规则，请求公共国际团体供给关于正在审理案件之情报。该项团体自动供给之情报，法院应接受之。

这类组织仍不能在诉讼案件中作为当事方出庭。然而，联合国和授权的专门机构可以在法律问题上寻求咨询意见。¹²

9. 鉴于法院规约中的这些限制，希望利用国际法院解决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国际争端，表现在两个方面——所谓“具有约束力”的咨询意见，和要求修改规则。

10. 虽然咨询意见本身是不具有约束力的，但一些协定规定，采用咨询意见程序解决争端具有“决定性”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46年的《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

如联合国与一个会员国间发生争议，应依照宪章第九十六条及法院规约第六十五条请法院就所牵涉的任何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当事各方应接受法院所发表的咨询意见为具有决定性效力。¹³

11. 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总部协定，在有约束力的仲裁方面设想了一个大体类似的程序，该协定规定：任何一方均可请求大会对仲裁过程中产生的法律问题提出咨询意见，仲裁法庭在作出最后裁决时将会“予以考虑”。¹⁴

三、法院于某一案件遇有公共国际团体之组织约章、或依该项约章所缔结之国际协约、发生解释问题时，书记官长应通知有关公共国际团体并向其递送所有书面程序之文件副本。”另见2005年增加的法院规则第四十三条第二和第三款。

¹² 《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各种专门机关，对于其工作范围内之任何法律问题，得随时以大会之授权，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

¹³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第八条，第三十节。另见，例如，《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第九条，第三十二节；《国际原子能机构特权和豁免协定》，第十条，第三十四节；《智利政府与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关于委员会总部在智利运作条件的协定》，第十一条，第21节(1953年2月16日，圣地亚哥)，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14卷，第4541号，第49页；《联合国与泰国政府关于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泰国总部的协定》，第十三条，第二十六节(1954年5月26日，日内瓦)，同上，第260卷，第3703号，第35页；均引自J. Sztucki,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Parties to Contentious Proceeding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载于A. S. Muller, D. Raič and J. M. Thuránszky (ed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ts Future Role After Fifty Year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97), 第141页，脚注24-25。

¹⁴ 《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1947年6月26日，纽约成功湖)，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1卷，第147号，第11页，第八条，第二十一节：

“(甲) 联合国及美国关于解释及实施本协定或任何补充协定之争执，如未能由磋商或其他双方同意之办法解决者，应提交三名仲裁员组织之法庭裁定。仲裁员之一由秘书长提名，

12. 然而,在现实中具有争议的问题上采用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存在明显的困难。对具有约束力的咨询程序持批评意见者认为,它不能替代国际组织直接诉诸法院。对咨询程序适用的管辖权规则过于宽泛,但又在其他方面过于狭窄,既破坏了当事方之间诉诸程序的平等性,又使得某些争端的解决较之其他争端产生了优先性。

13. 这两个不理想的结果都是因为只有联合国和它的专门机构能够要求法院提供咨询意见。¹⁵也就是说,在一个此类机构和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只有该机构能够提出“要求”。当然,如果条约义务要求将争端提交咨询程序,联合国和专门机构都必须那样做。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当事各方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对称的,因为“将问题提交法院要由一个具体的机关来决定,有关的成员国[或其他当事方]都不能掌控提交程序”。¹⁶

14. 同样,只有联合国和它授权的专门机构能够要求提供咨询意见,意味着利用咨询程序解决涉及国际组织的争端,将主要局限于这类国际组织作

另一由美国国务卿提名,第三人由秘书长及国务卿一同抉择,如双方不能同意第三仲裁员时,则由国际法院院长指派之。

“(乙)秘书长或美国得就此项程序引起之法律问题请大会征询国际法院之咨询意见。于接获法院之意见以前,双方应遵从仲裁法庭之临时裁定。其后,仲裁法庭得参照法院之意见作成最后裁定。”

也见《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与加拿大政府关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总部的协定》(1951年4月14日,蒙特利尔)第七条第31节,联合国,《条约汇编》,第96卷,第1335号,第155页。

¹⁵《国际法院规约》第六十五条提到《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一、大会或安全理事会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得请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二、联合国其他机关及各种专门机关,对于其工作范围内之任何法律问题,得随时以大会之授权,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得到此授权的机构包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和大会临时委员会。得到授权的专门机构包括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国际开发协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得到授权,可以请求提供咨询意见,尽管它不是一个联合国专门机构。见“授权请求发表咨询意见的机关和机构”,可查阅 www.icj-cij.org/en/organs-agencies-authorized。

¹⁶ K. Wellens, *Remedies against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第233页。另见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议案,咨询意见,《199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2页起,详见第81页,第36段。

为当事方的争端。当然,其他争端当事方也可以请求大会或其他某个授权机构提请发布咨询意见,但他们无法确定大会是否确实会去寻求咨询意见,或者以他们所希望的方式寻求咨询意见。¹⁷正如委员会自己之前已经指出的,这类咨询意见将是“不完美的”,“不确定的”,“让由此获得的咨询意见具有约束力,也将充满不确定因素”。¹⁸

15. 考虑到国际法院对解决有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冲突能力有限,¹⁹在过去的几年里,曾经提出过很多修改规约的建议。1970年,大会举行了“审议国际法院作用”的讨论,之后进行过一项调查,包括一个问题——“允许国际组织作为法院当事方的可能性”。在对调查作出的31份答复中(当时法院规约有130个缔约国),15个成员国作了肯定答复(阿根廷、奥地利、加拿大、塞浦路斯、丹麦、芬兰、危地马拉、伊拉克、马达加斯加、墨西哥、新西兰、瑞典、瑞士、联合王国和美国),一个否定答复(法国)。²⁰1997-1999年,大会关于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审议了危地马拉²¹和哥斯达黎加的提案²²——允许国际组织诉诸国际法院。危地马拉在1999年收回了提案,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提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十分渺茫”。²³

¹⁷ 在这方面,见《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1986年)第66条第2款中复杂的争端解决条款。

¹⁸ 《1980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7-88页,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的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缔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第66条评注第(9)至第(11)段;另见《1982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5页,委员会第三十三和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条款草案最终版本第66条的评注第(4)至第(6)段。如前一脚注所示,各国拒绝了这些建议,即不将咨询程序纳入后来成为《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的争端解决条款中。

¹⁹ 在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案中,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必须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所有成员国单独提出索赔,而不是对北约提出一项索赔,之后便有人提出了司法经济的考虑。

²⁰ 《审查国际法院的作用,秘书长的报告》(A/8382号文件),问题III(a),第5和第200-224段。另见A/8382/Add.1号文件,第6页;A/8382/Add.3号文件,第4页;以及A/8382/Add.4号文件,第3页。

²¹ A/AC.182/L.95/Rev.1号文件。

²² A/AC.182/L.97号文件。

²³ 见Wellens(上文脚注16),第237-238页;另见P. Couvreur, “Développements récents concernant l'accès des organisations intergouvernementales à la procédure contentieuse devant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载于E. Yakpo and T. Boumedra (eds.),

16. 除在修正《国际法院规约》方面会面临的政治困难之外,各种提议已令人注意到了属人管辖和属事管辖的范围问题——要赋予国际组织在国际法院的诉讼地位,对《规约》的任何修正都必须处理这一问题。

17. 与国际法院不同的是,在一些特定条约下运作的其他常设法院和法庭对作为相关条约缔约方的国际组织开放。例如,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海洋法国际法庭便是这种情况,²⁴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构也是如此。

2. 国际仲裁

18. 仲裁是解决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国际争端的一个有用的手段。它不仅可以避免在国际法院面前出现的资格问题上的困难,而且还为当事方提供了一套灵活的制度,如有必要,能够保守秘密。

19. 以往也曾鼓励利用仲裁解决涉及国际组织的争端,这种努力可以追溯到1966年国际法协会关于国际仲裁的决议,该决议:

提请所有国家注意利用国际仲裁庭解决各种国际性争端,包括(a)不能提交国际法院的国际争端,……(c)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争端。²⁵

20. 同样,第六委员会联合国国际法十年工作组也曾于1992年提出一项建议,“敦促更广泛地利用常设仲裁法院以解决国家间争端和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争端”。²⁶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国际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必须或实际上能够将它们与国家或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性争端提交仲裁。与国家不同的是,目前没有对国际组织开放的一般性条约,使国际组织能够接受将这类争端提交仲裁的义务。可以肯定一些双边协定中载有此类条款。但是没有对有关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国际协定中的仲裁的条款或根据这类条款作出仲裁的情况进行过普遍调查。到

目前为止,在公共领域,好像只有四起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的仲裁。²⁷

21.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仲裁条款如何起草。现行的做法是包含以下行文的仲裁条款:

当事方之间因本协定产生的或与本协定有关的任何争端,未能通过谈判和其他商定的解决方式得到解决,应在任何一方的请求下,提交一个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的法庭。每个当事方应任命一名仲裁员,由此任命的两名仲裁员应任命第三位仲裁员,该人将担任仲裁庭的主席。如果在提出仲裁请求的30天内,一个当事方未能任命仲裁员,或如果在任命两名仲裁员之后的15天内尚未任命第三位仲裁员,任何一个当事方均可要求国际法院院长任命所说的仲裁员。仲裁庭应确定本庭的程序,条件是任何两位仲裁员即构成对一切问题上的法定人数,所有决定均须得到任何两位仲裁人的同意。仲裁庭的开支将由当事方按仲裁庭的摊派承担。仲裁结果将包含一份说明其理由的声明,并且将是最终的,对当事方具有约束力。²⁸

22. 程序方面也可能会出现问题。但如果这些问题涉及仲裁规则,则基本上都通过常设仲裁法院涉及国际组织和国家仲裁任择规则(1996)来处理。由于制定这些规则时考虑到了“涉及国际组织和国家的争端带有国际公法的性质,以及与这类争端相适应的外交实践”,²⁹因此,举例来说,委员会将1958年

²⁷ 向居住在法国的教科文组织退休职员支付的退休金的税收制度问题案,2003年1月14日的裁决,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十五卷(出售品编号E/F.05.V.5),第231页;欧洲分子生物实验室仲裁案(欧洲分子生物实验室诉德国),1990年6月29日,《国际法汇编》,第105(1997)卷,第1页。另一个最新的案例未经裁决结案,是拉蓬塔市区(秘鲁)诉联合国项目事务署案,常设仲裁法院,案件编号:2014-38 (<https://pcacases.com/web/view/109>);还有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提出的大西洋—斯堪的纳维亚鲱鱼仲裁案(丹麦王国关于法罗群岛诉欧洲联盟),常设仲裁法院,案件编号:2013-30 (<https://pcacases.com/web/view/25>),也未经裁决结案。

²⁸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在开罗设立开发署阿拉伯国家区域中心的协定》(2010年7月29日,纽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790卷,第49092号,第157页,第十五条,第32节。近期载有类似规定的协定示例包括:《联合国与大韩民国政府关于在仁川设立联合国减灾办公室的协定》(2010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埃及政府的协定》以及《马来西亚政府与联合国开发署关于设立开发署全球共享服务中心的协定》(2011年10月24日,吉隆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794卷,第49154号,第67页。关于更早期的仲裁条款,可参见《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上文脚注14),第11页。关于这类早期条款项下的仲裁义务分析,见1947年6月26日联合国总部协定第二十一节所规定仲裁义务的适用案,咨询意见,《1988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2页;和平条约的解释案,咨询意见,《195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5页起,详见第77页。

²⁹ 常设仲裁法院,《常设仲裁法院涉及国际组织和国家仲裁任择规则》(1996年),导言。

Liber Amicorum Judge Mohammed Bedjaoui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 第293页起,详见302-322页。

²⁴ 见1982年公约附件九,其中的第七条对国际组织与一个或多个成员国同为争端当事方的情况或共同利益方的情况专门作了规定。欧洲联盟曾经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第7号案——养护和可持续开发东南太平洋箭鱼种群案(智利/欧洲共同体)中作为当事方。

²⁵ 国际法协会,“联合国宪章(国际仲裁)”,第五十二届会议报告,1966年8月14日至20日,赫尔辛基,第十二页,第1段。

²⁶ A/C.6/47/L.12号文件,第15段。

的仲裁程序示范规则³⁰加以改写用于涉及国际组织的争端或许并无太大价值。

3. 非法律机制

23. 为了符合救济的重点,国际法协会关于国际组织责任问题的最后报告提请人们注意“[国际组织]不太正式行为”的“预防潜力”。³¹相应地,其建议首先集中于在该国际组织自身内部建立常设机制,包括监察员办公室,以及类似世界银行监察组的机构。³²对本专题而言,这种机制很可能仅在一国为其国民行使外交保护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关于相关论述,见下节)。

24. 如果委员会的工作侧重于解决国际法之下所产生的争端,则相关的非法律机制主要是第三方机制,例如调查、³³调解与和解。委员会可考虑如何鼓励各方采用这种机制。这些机制虽然形式上属于非法律机制,但可在解决法律争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 主张的可受理性: 职能保护

25. 之前几节已经论述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的渠道问题。但是,即便存在渠道,仍然很可能产生与主张的可受理性有关的习惯规则如何对国际组织适用的问题。一个颇具争议的领域是,如何套用有关外交保护和用尽当地救济的习惯规则。³⁴

26. 依照国际法院就损害赔偿案发表的咨询意见,国际组织能够“为其代理人采取某种形式的保护

措施”,³⁵大体上与一国为其国民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力相似。由于这一类比,有人提出,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³⁶也应适用于“职能保护”,一如其适用于外交保护。³⁷

27. 然而,更仔细的分析显示,这一比较可能并不确切。国际法院在损害赔偿案意见中的推理与外交保护的理论基础颇为不同。一方面,外交保护源自国家“代表其臣民确保国际法规则得到尊重的权利”。³⁸这是一项国家享有的一般性权利,源自国籍的联系。而职能保护则是一项隐含的权力,源自该组织履行自身职能的需要。³⁹因此它是一项有限的权力,范围仅限于代理人成功履行职责所需。

28. 与国际组织行使职能保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职能保护能否被用于向工作人员的国籍国提出主张。⁴⁰外交保护源自国籍,而职能保护源自职能

³⁵ 对执行联合国职务时所受伤害的赔偿案,咨询意见(见上文脚注9),第184页。2006年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将外交保护定义为“一国对于另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给属于本国国民的自然人或法人造成损害,通过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解决手段援引另一国的责任,以期使该国责任得到履行”(2007年12月6日第62/67号大会决议,附件;有关评论,见《200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2页,第50段)。

³⁶ 外交保护条款第14-15条(同上)定义了外交保护背景下用尽当地救济这一要求的范围。

³⁷ 见C. Eaglet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law of responsibility”,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50*, vol. 76, 第319页起,详见第351-352页; Dopagne (上文脚注9), 第1108页; A. A. Cançado Trindade,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and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sciences diplomatiques et politiques*, vol. 57, No. 2 (April-June 1979), 第81页起,详见第82-83页。Eagleton甚至断言,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适用于联合国提出的所有主张,即便“在联合国声称自身受到一国损害时”也是如此(见第352页)。这源自一种错误的认识,即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不仅适用于一国为一国民行使外交保护的情况,也适用于对一外国造成的直接伤害。Amerasinghe正确地指出,关于对国家造成的直接伤害,“若已经给组织造成了直接伤害,则[用尽]这一规则不适用”(C. F. Amerasinghe, *Principles of the Institutional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第482页)。

³⁸ 常设国际法院,马夫罗马蒂斯在巴勒斯坦的特许权案,《常设国际法院汇编》,A辑,第2号(1924年),第12页。

³⁹ 见对执行联合国职务时所受伤害的赔偿案,咨询意见(上文脚注9),第181-184页。

⁴⁰ 见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7条(上文脚注35):“一国国籍国不得为同属另一国国民的人针对另一国籍国行使外交保护,除

³⁰ 《1958年……年鉴》[英],第二卷,A/3859号文件,第83-86页,第22段。

³¹ 国际法协会(共同报告员Shaw和Wellens),“国际组织问责最终报告(Final report on accoun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第七十一届会议的报告》,2004年8月16日至21日,柏林,第164页起,详见第224页。

³² 同上,第223-224页,建议2-5。

³³ 国际法协会建议,国际组织“可考虑设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调查任何已成为公众严重关切问题的事项”(同上,第224页,建议6)。国际法协会特别提到《调查联合国在1994年卢旺达发生灭绝种族事件期间所采取的行动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S/1999/1257号文件,附件)和《秘书长依照大会第53/35号决议提出的报告》(A/54/549)(同上,第226页)。

³⁴ 由秘书处编写的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其地位、特权和豁免的实践的研究报告对1967年前的实践进行了简要介绍(《1967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L.118和Add.1和2号文件,第218-220页,第49-56段(关于联合国);以及第302页,第23段(关于专门机构))。

方面的考虑,有鉴于这一差异,上述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肯定的。⁴¹在这方面,应当指出,坎马拉斯瓦米案和马齐卢案的咨询意见均涉及联合国与官员国籍国之间的争端。⁴²

29. 若外交保护所针对的对象是国际组织,则会产生不同的关切。原则上,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可以比照适用;在这方面,宜当谈及内部救济而非当地救济。⁴³不过,国际法学会在1971年的一项决议中表示了一种推定,即针对国际组织行使外交保护的,不作用尽要求。⁴⁴还有人进一步提出,该规则源自“个

非在发生损害之日和正式提出求偿之日,该国的国籍均为该人的主要国籍。”

⁴¹ 见 Amerasinghe(上文脚注37),第487-488页。

⁴² 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端案,咨询意见(见上文脚注16);以及《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第六条第二十二节的适用案,咨询意见,《198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7页。

⁴³ 见 J.-P. Ritter, “La protection diplomatique à l’égard d’une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8 (1962), 第427页起,详见第454页。

⁴⁴ 国际法学会(报告员 de Visscher),关于“在联合国部队可能参与的敌对行动中适用人道战争规则的条件”的决议,第8条:“同样值得期待的是,如果这些机构是联合国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指定或设立的,或者如果类似机构的管辖权已被受害人所属的国家接受,那么除非受害人已经充分利用了由此提供的救济措施,否则该国家不得向联合国提出索赔。”(《国际法学会年鉴》,第54卷,第二部分(1971年,萨格勒布会议),第454页(可查阅国际法学会网站:www.idi-iil.org))。

人与应诉国之间的管辖权联系”,因此并不适用。⁴⁵在1965年和1966年联合国与比利时、希腊、意大利、卢森堡和瑞士之间的解决协定中,可以找到各国似乎行使了外交保护权的实例。在这些协定中,联合国同意向所涉国家的国民支付赔偿金,以补偿其在刚果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害。⁴⁶

⁴⁵ Amerasinghe(上文脚注37),第486页。

⁴⁶ 《构成联合国和比利时关于解决比利时国民对联合国刚果行动求偿案的协定的换文》(1965年2月20日,纽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35卷,第7780号,第197页;《构成联合国和希腊关于解决希腊国民对联合国刚果行动求偿案的协定的换文》(1966年6月20日,纽约),同上,第565卷,第8230号,第3页;《构成联合国和意大利关于解决意大利国民对联合国刚果行动求偿案的协定的换文》(1967年1月18日,纽约),同上,第588卷,第8525号,第197页;《构成联合国和卢森堡关于解决卢森堡国民对联合国刚果行动求偿案的协定的换文》(1966年12月28日,纽约),同上,第585卷,第8487号,第147页;《构成联合国和瑞士关于解决瑞士国民对联合国刚果行动求偿案的协定的换文》(1966年6月3日,纽约),同上,第564卷,第621号,第193页。另见 M. Guillaume, “La réparation des dommages causés par les contingents français en ex-Yougoslavie et en Albanie”,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43 (1997), 第151页;以及 K. Schmalenbach, “Dispute Settlement (Article VIII Sections 29-30 General Convention)”, 载于 A. Reinisch (ed.), *The Conventions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Specialized Agencies: A Comment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第529页起,详见第530页。

主要参考文献

- AGO, R., “Les avis consultatifs ‘obligatoires’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problèmes d’hier et d’aujourd’hui”, in D. Bardonnet, et al. (ed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au service de la paix, de la justice et du développement: Mélanges Michel Virally*, Paris, Pedone, 1991, pp. 9–24.
- , “‘Binding’ advisory opin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5, No. 3 (July 1991), pp. 439–451.
- AMERASINGHE, C. F., *Principles of the Institutional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 *Local Reme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ARSANJANI, M. H., “Claims agains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 *Yale Journal of World Public Order*, vol. 7 (1980–1981), pp. 131–176.
- AUDÉOUD, O.,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et le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ds au sein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vol. 81 (1977), pp. 945–1006.
- BACOT, G., “Réflexions sur les clauses qui rendent obligatoires les avis consultatifs de la C.P.J.I. et de la C.I.J.”,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vol. 84 (1980), pp. 1027–1067.
- BEDJAOU, M.,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before the Sixth Committee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status report and prospects,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Forty-ninth Session, Sixth Committee, 16th Meeting, 24 October 1994 (A/C.6/49/SR.16)*, paras. 3–16.
- BELLIER, S., *Le recours à l’arbitrage par l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L’Harmattan, 2011.
- BINDSCHEDLER, D., “Le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ds relatifs au statut d’un organisme international”,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68*, vol. 124, pp. 453–547.
- BOISSON DE CHAZOURNES, L., “Advisory opinions and the furtherance of the common interest of humankind”, in L. Boisson de Chazournes,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Trend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Transnational, 2002, pp. 105–118.
- BOWETT, D. W., “Letter to the Editor in Chief”,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6, No. 2 (April 1992), p. 342.
- CAHIER, P., *Étude des accords de siège conclus entre l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les États où elles résident*, Milan, Giuffrè, 1959.
- CANÇADO TRINDADE, A. A.,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and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e sciences diplomatiques et politiques*, vol. 57, No. 2 (April–June 1979), pp. 81–123.
- COUVREUR, P., “Développements récents concernant l’accès des organisations intergouvernementales à la procédure contentieuse devant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in E. Yakpo and T. Boumedra (eds.), *Liber Amicorum Judge Mohammed Bedjaoui*,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 p. 293.
- DOMINICÉ, C., “Request of advisory opinions in contentious cases?”, in L. Boisson de Chazournes,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Trend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Transnational, 2002, pp. 91–104.
- , “Le règlement juridictionnel du contentieux externe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in D. Bardonnet, et al. (ed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au service de la paix, de la justice et du développement: Mélanges Michel Virally*, Paris, Pedone, 1991, pp. 225–238.
- DOPAGNE, F., “Les différends opposant l’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à un État ou une autre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in E. Lagrange and J.-M. Sorel (eds.), *Droit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2013, pp. 1101–1120.
- DUPUY, R.-J., “L’adaptation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au monde d’aujourd’hui”, *Revue belg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66-1), pp. 28–49.
- EAGLETON, 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law of responsibility”,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50-I*, vol. 76, pp. 319 et seq.
- FITZMAURICE, G., “Enlargement of the contentious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in L. Gross (e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vol. II, Dobbs Ferry, New York, Oceana, 1976, pp. 461–498.
- , “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ribunals”,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52*, vol. 29, pp. 1–62.
- FURUKAWA, T., “Le double rôle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à l’égard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protection et contrôle”, in *Mélanges offerts à Paul Reute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unité et diversité*, Paris, Pedone, 1981, pp. 293–314.
- GRAY, C. D., *Judicial Reme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 GROSS, L.,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onsideration of requirements for enhancing its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in L. Gross (e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vol. I, Dobbs Ferry, New York, Oceana, 1976, pp. 22–104.

- GUILLAUME, M., “La réparation des dommages causés par les contingents français en ex-Yougoslavie et en Albanie”,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43 (1997), pp. 151–166.
- HARDY, M. J. L., “Claims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respect of injuries to their agents”,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61, vol. 37, pp. 516–526.
- HOFFMEISTER, 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 (2012), pp. 77–105.
- and P. ONDRUSEK,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international litigation”, *Revue Helléniq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61 (2008), pp. 205–224.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Wengler, Rapporteur), “Recours judiciaires à instituer contre les décisions d’organes internationaux”, *Yearbook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7 (Session of Amsterdam, 1957), part I, p. 5.
- (Huber, Rapporteur), “Étude des amendements à apporter au Statut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Yearbook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5 (Session of Aix-en-Provence, 1954), part I, pp. 407 *et seq.*
-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Resolutions: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eport of the Fifty-second Conference*, Helsinki, 14–20 August 1966, p. xii.
- (Shaw and Wellens, Co-Rapporteurs), “Final report on accoun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Report of the Seventy-first Conference*, Berlin, 16–21 August 2004, pp. 164–234.
- (Schwarzenberger, Rapporteur), “Resolutions: review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Forty-seventh Conference*, Dubrovnik, 26 August–1 September 1956, p. viii.
- JENKS, C. W.,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London, Stevens, 1964.
- ,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Transactions of the Grotius Society*, vol. 32 (1946), pp. 1–41.
- JENNINGS, R. 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fter fifty year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9, No. 3 (July 1995), pp. 493–505.
- , “Comité restreint sur le règlement pacifique des différends: Note préliminaire”, *Yearbook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5 (Session of Milan, 1993), part II, pp. 279–284.
- JULLY, L., “Arbitration and judicial settlement: recent trend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8 (1954), pp. 380–407.
- KLABBERS, J., *Advanced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5.
- LA ROSA, A.-M., “Links between the ILO and the ICJ: a less than perfect match”, in L. Boisson de Chazournes,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Trend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Transnational, 2002, pp. 119–132.
- LAUTERPACHT, E., *Aspects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Cambridge, Grotius, 1991.
- LAUTERPACHT, H., “The revision of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ir Elihu Lauterpacht”,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vol. 1 (2002), pp. 55–128.
- , *International Law and Human Rights*, London, Stevens, 1950.
- MACPHERSON, B. F., *World Court Enhancements to Advance the Rule of Law*, Monograph No. 13 of the Center for UN Reform Education (1994).
- MARTENCZUK, B., “The Security Council,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and judicial review: what lessons from Lockerbi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 No. 3 (1999), pp. 517–547.
- MOUSSÉ, J., *Le contentieux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de l’Union européenne*, Brussels, Bruylant, 1997.
- MULLER, A. 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Host States: Aspects of their Legal Relationship*,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5.
- PARRY, C., “Some considerations up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in international law”,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56, vol. 90, pp. 654–723.
-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Optional Rules for Arbitration Involv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1996).
- REINISCH, 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fore National Cour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ed.), *The Conventions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Specialized Agencies: A Comment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RITTER, J.-P., “La protection diplomatique à l’égard d’une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8 (1962), pp. 427–456.
- ROMANO, C. P. 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process: an overview”, in L. Boisson de Chazournes,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Trend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Transnational, 2002, pp. 3–36.

- ROSENNE, S.,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1920–2005*, 4th ed.,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6.
- SAROOSHI, D. (ed.), *Remedies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tion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14.
- SCHMALENBACH, K., “Dispute settlement”, in J. Klabbers and A. Wallendahl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1, pp. 251–284.
- SCHWEBEL, S. M., “Authorizing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request advisory opin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J. Makarczyk (ed.),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Honor of Judge Manfred Lach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4, pp. 519–529.
- SEIDL-HOHENVELDERN, I., “Acces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A. S. Muller, et al. (ed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ts Future Role After Fifty Year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97, pp. 189–203.
- SEYERSTED, F., “Settlement of internal disputes of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urts”, *Heidelber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4 (1964), pp. 1–121.
- SZASZ, P. C., “Grant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us Standi*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A. S. Muller, et al. (ed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ts Future Role After Fifty Year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97, pp. 169–188.
- SZTUCKI,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parties to contentious proceeding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A. S. Muller, et al. (ed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ts Future Role After Fifty Year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97, pp. 141–167.
- THALLINGER, G., “The rule of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7 (2008), pp. 401–428.
- TREVES, 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parties to contentious cases: selected aspects”, in L. Boisson de Chazournes,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Trend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Transnational, 2002, pp. 37–46.
- UNITED NATIONS, Review of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8382 and Add.1–4) (1971).
- , The pract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concerning their status,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study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iat, *Yearbook ... 1967*, vol. II, document A/CN.4/L.118 and Add.1–2, pp. 154–324.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Study on widening acces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LM, vol. 16 (1977), pp. 187–206.
- WELLENS, K., *Remedies against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ZOLLIKOFER, P. L., *Les relations prévues entre les institutions spécialisées des Nations Unies et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Leiden, Sijthoff, 1955.